

浙江学者丝路敦煌学术书系

礼俗之间——敦煌书仪散论

吴丽娱 著

浙江学者丝路敦煌学术书系

礼俗之间——
敦煌书仪散论

吴丽娱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礼俗之间:敦煌书仪散论/吴丽娱著.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12

(浙江学者丝路敦煌学术书系/柴剑虹,张涌泉,刘进宝主编.)

ISBN 978-7-308-15177-1

I. ①礼… II. ①吴… III. ①敦煌学—语言学—研究
②敦煌学—礼仪—研究 IV. ①H1 ②K892.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27120 号

礼俗之间——敦煌书仪散论

吴丽娱 著

出品人	鲁东明
总编辑	袁亚春
丛书策划	黄宝忠 宋旭华
责任编辑	胡 畔
责任校对	杨利军 陈晓璐
封面设计	项梦怡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兴邦电子印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4.625
字 数	336 千
版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5177-1
定 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中心联系方式 (0571)88925591;<http://zjdxcbbs.tmall.com>

浙江大学文科高水平学术著作出版基金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

资助

[浙江大学“一带一路”合作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

浙江学者丝路敦煌学术书系编辑委员会

主 编 柴剑虹 张涌泉 刘进宝 (执行)

编 委 (按姓氏笔划排序)

王惠民 卢向前* 冯培红 许建平 刘进宝 刘 波

张先堂 张涌泉 赵声良 施新荣 柴剑虹

(加*者是本册责任编委)

总 序

浙江,我国“自古繁华”的“东南形胜”之区,名闻遐迩的中国丝绸故乡;敦煌,从汉武帝时张骞凿空西域之后,便成为丝绸之路的“咽喉之地”,世界四大文明交融的“大都会”。自唐代始,浙江又因丝绸经海上运输日本,成为海上丝路的起点之一。浙江与敦煌、浙江与丝绸之路因丝绸结缘,更由于近代一大批浙江学人对敦煌文化与丝绸之路的研究、传播、弘扬而令学界瞩目。

近代浙江,文化繁荣昌盛,学术底蕴深厚,在时代进步的大潮流中,涌现出众多追求旧学新知、西学中用的“弄潮儿”。20世纪初因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文献流散而兴起的“敦煌学”,成为“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中国学者首先“预流”者,即是浙江的罗振玉与王国维。两位国学大师“导夫先路”,几代浙江学人(包括浙江籍及在浙工作生活者)奋随其后,薪火相传,从赵万里、姜亮夫、夏鼐、张其昀、常书鸿等前辈大家,到王仲荦、潘絮兹、蒋礼鸿、王伯敏、常沙娜、樊锦诗、郭在贻、项楚、黄时鉴、施萍婷、齐陈骏、黄永武、朱雷等著名专家,再到徐文堪、柴剑虹、卢向前、吴丽娱、张涌泉、王勇、黄征、刘进宝、赵丰、王惠民、许建平以及冯培红、余欣、窦怀永等一批更年轻的研究者,既有共同的学术追求,也有各自的学术传承与治学品格,在不

同的分支学科园地辛勤耕耘,为国际“显学”敦煌学的发展与丝路文化的发扬光大作出了巨大贡献。浙江的丝绸之路、敦煌学研究者,成为国际敦煌学与丝路文化研究领域举世瞩目的富有生命力的学术群体。这在近代中国的学术史上,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

始创于 1897 年的浙江大学,不仅是浙江百年人文之渊薮,也是近代中国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英才辈出的名校。其百年一贯的求是精神,培育了一代又一代脚踏实地而又敢于创新的学者专家。即以上述研治敦煌学与丝路文化的浙江学人而言,不仅相当一部分人的学习、工作与浙江大学关系紧密,而且每每成为浙江大学和全国乃至国外其他高校、研究机构连结之纽带、桥梁。如姜亮夫教授创办的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原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1984 年受教育部委托,即在全国率先举办敦煌学讲习班,培养了一批敦煌学研究骨干;本校三代学者对敦煌写本语言文字的研究及敦煌文献的分类整理,在全世界居于领先地位。浙江大学与敦煌研究院精诚合作,在运用当代信息技术为敦煌石窟艺术的鉴赏、保护、修复、研究及再创造上,不断攻坚克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拓展了敦煌学的研究领域。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原语言文学分会基础上成立的浙江省敦煌学研究会,也已经成为与甘肃敦煌学学会、新疆吐鲁番学会鼎足而立的重要学术平台。由浙大学者参与主编,同浙江图书馆、浙江教育出版社合作编撰的《浙藏敦煌文献》于 21 世纪伊始出版,则在国内散藏敦煌写本的整理出版中起到了领跑与促进的作用。浙江学者倡导的中日韩“书籍之路”研究,大大丰富了海上丝路的文化内涵,也拓展了丝路文化研究的视野。位于西子湖畔的中国丝绸博物

馆,则因其独特的丝绸文物考析及工艺史、交流史等方面的研究优势,并以它与国内外众多高校及收藏、研究机构进行实质性合作取得的丰硕成果而享誉学界。

现在,我国正处于实施“一带一路”伟大战略的起步阶段,加大研究、传播丝绸之路、敦煌文化的力度是其中的应有之义。这对于今天的浙江学人和浙江大学而言,是在原有深厚的学术积累基础上如何进一步传承、发扬学术优势的问题,也是以更开阔的胸怀与长远的眼光承担的系统工程,而决非“应景”、“赶时髦”之举。近期,浙江大学创建“一带一路”合作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举办“丝路文明传承与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都是新的历史条件下迈出的坚实步伐。现在,浙江大学组织出版这一套学术书系,正是为了珍惜与把握历史机遇,更好地回顾浙江学人的丝绸之路、敦煌学研究历程,奉献资料,追本溯源,检阅成果,总结经验,推进交流,加强互鉴,认清历史使命,展现灿烂前景。

浙江学者丝路敦煌学术书系编委会

2015年9月3日

出版说明

本书系所选辑的论著写作时间跨度较长,涉及学科范围较广,引述历史典籍版本较复杂,作者行文风格各异,部分著作人亦已去世,依照尊重历史、尊敬作者、遵循学术规范、倡导文化多元化的原则,经与浙江大学出版社协商,书系编委会对本书系的文字编辑加工处理特做以下说明:

一、因内容需要,书系中若干卷采用繁体字排印;简体字各卷中某些引文为避免产生歧义或诠释之必需,保留个别繁体字、异体字。

二、编辑在审读加工中,只对原著中明确的讹误错漏做改动补正,对具有时代风貌、作者遣词造句习惯等特征的文句,一律不改,包括原有一些历史地名、族名等称呼,只要不存在原则性错误,一般不予改动。

三、对著作中引述的历史典籍或他人著作原文,只要所注版本出处明确,核对无误,原则上不比照其他版本做文字改动。原著没有注明版本出处的,根据学术规范要求请作者或选编者尽量予以补注。

四、对著作中涉及的敦煌、吐鲁番所出古写本,一般均改用通行的规范简体字或繁体字,如因论述需要,也适当保留了

一些原写本中的通假字、俗写字、异体字、借字等。

五、对著作中涉及的书名、地名、敦煌吐鲁番写本编号、石窟名称与序次、研究机构名称及人名,原则上要求全卷统一,因撰著年代不同或需要体现时代特色或学术变迁的,可括注说明;无法做到全卷统一的则要求做到全篇一致。

书系编委会

目 录

我与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	(1)
-------------------	-------

上编 书仪的书式与仪体	(7)
-------------------	-------

一 关于 S.078v 和 S.1725v 两件敦煌写本书仪的一些看法	(9)
二 关于敦煌 S.5566 书仪的研究——兼论书仪中的“状”	(39)
三 从敦煌吐鲁番文书看唐代地方机构行用的状	(66)
四 唐代书仪中单、复书形式简析	(121)
五 再论复书与别纸	(159)

中编 礼法与制度	(183)
----------------	---------

六 试论敦煌书仪中的官场起居仪	(185)
七 晚唐五代中央地方的礼仪交接——以节度刺史的拜官中谢、上事为中心	(211)
八 试论晚唐五代的客司、客将与客省	(254)
九 再论 S.1725v 卷祭文与敦煌官方祭祀	(280)

下编 礼仪与民俗	(301)
一〇 敦煌写本书仪中的行第之称	
——兼论行第普及的庶民影响	(303)
一一 关于“敛发”与“散发”	
——论少数民族风俗对丧礼影响之一例	(346)
一二 “中祥”考	
——兼论中古丧制的祥忌遇闰与斋祭合一	(362)
一三 正礼与时俗	
——论民间书仪与唐朝礼制的同期互动	(398)
一四 关于敦煌《朋友书仪》的研究回顾与问题展说	
.....	(426)
后 记	(454)

我与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

第一次知道什么是敦煌吐鲁番文书,是在业师王永兴先生的文书课上。记得王先生在上课之前,就拿着几份复印的吐鲁番文书抄件底稿分发给我们——上他课的几个研究生,我和张小舟分到的是关于高昌县车坊的文书。由于事前完全一无所知,更没有见过类似的东西,所以我们根本不知先生口中一再重复的“做”文书为何物。但是先生说,你们不但要“做”出来,而且还要在北大新办的《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上发表。所以“做”自然就是要研究,要写出文章来。老师说做文书比写毕业论文更重要,如果学会了,论文也就不难了。这在当时听了,都是似懂非懂,其中的用意是在后来才得以领会。

先生的话令大家都很兴奋,于是各自动起手来。但是真正做起来,却是犯了难。对着前后残缺、没头没脑的文书,可以说根本读不懂。80年代初,敦煌知识没有普及,不要说做,就是知道有文书的人也不多。而我们的训练,就是从认字、解词、搜集相关材料开始。根据王先生教导的程序,文书先是要录文,然后认字、标点、校勘(结合其他文书和史料),再挑出不懂的词(尤其是制度方面的)作注释,然后才是全卷的说明和问题研究。我和杨宝玉先生直到后来做归义军研究,还是采取这样的做法。这种做法是一种基础性训练,宝玉那样做,应当也是她的导师白化文先生教导的。

对于我一个未经本科而直接读研究生的学生来说,这些在当

时都不是轻而易举的。由于唐史知识有限,往往不知道应当向哪个方面努力。就以注释而言,费尽千辛万苦才搞懂的词汇往往是前人不屑一顾的常识,或者早由前人解释过了。但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我开始对专业熟悉起来,不但熟悉了文书,而且熟悉了唐史,逐渐分清了自己应当掌握的知识和问题。

那个时候没有电脑,资料的搜集既少且慢。就车坊这个问题而言,史料不多,研究者更少,只有日本的加藤繁、日野开三郎等一二人进行过一些探讨,可参考的不多。吐鲁番文书资料的出现,可说对研究车坊乃至唐代的厩牧制度和交通都有很大的补充。不过我在当时并没意识到车坊资料的珍贵性,只是在老师指导下逐渐进入状态,将写出的文本不断修改。也许是这些修改都没有抓住要害,当改到八九遍之际终由老师帮助重新调整提纲,决定论述重点,才将论文完成——当然今天看来还是很浅薄,发表在《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三集上,可以说这是我在研究生期间为之努力最多也耗时最长的一件事。

现在回忆第一次“做”文书真是痛苦的过程,但我由此知道如何发现问题并围绕问题研究进而写出论文。之后果然像先生所说,一旦进入硕士论文的写作,我并没有费太大的劲就为自己找到了当时在国内尚无人关注过的题目,并完全独立完成。说也奇怪,先生并没有像文书那样要我一遍遍改,甚至也没有提出太多不同意见。写成后我只改了一遍就过关,并且顺利地通过答辩,其中的主要内容,后来还在《中华文史论丛》发表了。毫无疑问这完全是拜先生所赐,试想如果没有文书课的训练和实习,我是不可能顺利找到研究对象和路径的。

尽管如此,我在很长一段时间中仍然对文书有畏难情绪,虽然又已写了一二篇,但多是为应付开会,也完全不成气候,没能继续深入,后来的一些年更是几乎完全脱离了文书。想起来,还是

当时对文书没有感觉,也没有体会到其中的乐趣。我的师兄、师弟在多年的努力之后,于敦煌文书上都取得了成就,且差不多都成了执掌方面的一流专家。我执意脱离文书做唐史,这就错过了研究文书的最佳时机。结果唐史和文书都一文莫名,现在想起来也许那时的放弃是最大的失误。

直到1998年张弓先生主持的“敦煌典籍与唐五代历史文化”课题启动,我分工书仪部分,这才有了重新与文书打交道的机会。而在我之先,由于赵和平师兄已经将大部分文书做了分类整理,且借给我很多他用过的资料和前人论著,这使我能够比较轻易地了解了各类书仪的现存状态及内容特色,也从中找到了对文书的感觉。总之,经过多年以后,这一次的印象完全不同。也许是赵师兄将最难做的开发工作做完了,而将一座存有各种宝物的富矿留给了我,当那五光十色的藏室在眼前突然被打开后,我确实被其中的丰富内容深深吸引了。这之后的事情,自然是紧紧抓住书仪中的那些瑰宝,一个个认识、解剖。而理解、追踪它们的过程,也就像在海边捡拾美丽的贝壳,当你的发现越来越多时,你对大海的深邃和博大也会有着越来越难以描摹的感觉。

总之,也许是书仪本身距离当时的社会生活和人的思想感情最近,其丰富的内容使我接收到诸多鲜活的信息,感受到其中特殊的魅力。并且可以说,书仪与以前我见到的那些文书不同,所反映的层次和内容是多重的,它们确实为我们打开了一扇可以洞察世界的窗扉。不断的观察和发现也使我找到了研究的方向和出口,我感到问题基本上可以分做两方面,即一方面是对各类书仪分类和内容、事件的理解,从这方面你可以感受到书仪自身的制作变化与社会生活、历史沿革之间的紧密联系;而另一方面,就是书仪层次、方面不同而无处不在的礼法和制度。当发现礼仪这一造就书仪的核心内容,也就认识到了书仪的主体和灵魂。从这

里开始,我发现了足以开拓思路、走向中国民众社会生活和思想观念深处的一条路径,那就是通过作为中国国家形成基础的礼。礼的研究可以从小到大,从书仪扩充到中古礼制的诸多方面,使你对中国的历史发展及特色有一深刻全面的认识。可以说,对敦煌书仪的研究,拓展了我研究学问的格局和境界,改变了我的

人生。

对于书仪的研究,无疑增加了我的自信。我想就做学问而言,我是幸运的。而我个人的经历,也证明了敦煌吐鲁番文书对于认识历史的宝贵。但不可否认的是,研究文书需要一定的基础,而唐史就是我研究文书的另一臂膀。值得庆幸的是,王先生当年在开设文书课的同时,也开设了唐史与唐朝制度史,而我多年在唐史方面的努力也不能说是白费。之前成果少,是因为没有将两者沟通。而在进行书仪和礼仪研究的同时,我发现如果结合唐史,就会有不一样的理解,不一样的视野及结论。例如在《朋友书仪》的研究中,以前的研究都指出书仪的所在地域是甘肃、宁夏,而作者是长期滞留边州、远戍从役的官员或者藩镇掌书记一类。但我是依据经济史中西北六城水运使的建立及水运路线在唐五代延续的历史进一步解决了书仪的来源问题,认为书仪的描写实际上是代表水运官吏或运卒(官健)的身份和立场。过去多认为曹氏归义军始次朝贡成功是在后梁,且已形成定论。而我和杨宝玉先生重新解读书仪“别纸”的内涵,结合后梁自身的政治形势、统治地域以及梁廷的开国政策,得出的结论是曹议金的通使成功绝不是在后梁而是在后唐。至于后来我对《新集杂别纸》的研究更是建立在对河北藩镇及梁唐地缘政治分析的基础上,由此证明了后唐明宗时期的统治格局与书仪制作传播的关系。这样不仅文书研究得益于唐史,唐史研究也因文书而深入。以我个人的经验,这样的结合是不可少的。

当前,敦煌吐鲁番研究仍在吸引着年轻的学子,研究的方式和途径多种多样,不是这里所能涵盖的。本书旨在提供个人的一些心得,其中也大都是我结合文书和唐史的实践,相信今后的研究会有更为广阔的前景。而文书研究作为敦煌吐鲁番研究的一部分,始终期待着人们更多的发现,也始终是值得学者为之奉献一生的事业。